

暨南大学
JINAN UNIVERSITY



黄埔大道西观点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官网：<https://iesr.jnu.edu.cn/>
微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REPORT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Annual Report 2020

年度报告



目录 Contents

关于我们 01

我们的工作 02

大事记 03

研究团队 04

智库研究 11

政策咨询 18

政策传播 21

品牌活动 37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12月，是暨南大学为建设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智库发展价值观，坚持走以数据为基础的独立、新型智库发展道路。2017年，研究院建立了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同年，研究院首次荣登核心智库榜单，成为全国16家“高校智库A类——211高校经济领域”的入选智库之一。2018年，研究院入选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核心智库榜单，排名进入全国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前十名。2019年，研究院入选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成为民政部在华南地区唯一的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同年，入选光明日报、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

我们的价值观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致辞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智库研究基于自主的微观调查数据，致力于产出系列有影响力的政策性报告，为政府、公众、社会各界提供有料、有用、有深度的观点，启发民智，服务民众，创造有价值的思想产品。我们将及时把握国情脉络，系统总结中国经验，立足本土，放眼国际，力争将政策研究中心打造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独立专业的新型智库。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我们的工作



智库研究

基于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和国际水准的高水平论文，针对当下社会热点，聚焦民生领域，形成专业的智库观点、政策简报、调查报告等，为公众提供专业、客观的政策解读。



政策咨询

积极对接国家部委以及广东省的政策咨询需求，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国家部委，广东省委改革办、民政厅以及广州市政府展开深度合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产出多项具有政策价值的课题成果。



政策传播

积极与媒体合作，通过发表文章、媒体论坛传播 IESR 声音，扩大社会影响力，凝聚共识。依托自媒体平台“黄埔大道西观点”微信公众号，传播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政策文章。



品牌活动

依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高质量、国际化的学术平台，举办“问政暨南”、“暨南论道”、“IESR+”以及各类政策研讨会，共商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凝聚各方观点精华。

2020 大事记

- 2020年2月,《广东千村调查2019年研究报告》正式发布。澎湃新闻也对研究报告的部分章节进行了连载。
- 2020年初,由国务院参事室主办的《国是咨询》杂志,在2020年第2-3期中刊发我院两篇关于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研究成果。
- 2020年4月,我院副教授史炜、助理教授邱筠与耶鲁大学陈希的合作有关中国抗“疫”论文“Impa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China”被人口经济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接受发表。该文研究了我国的防控政策如何遏制了由人口流动产生的疫情扩散,对其他国家应对当前疫情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中央电视台、人民网、环球网等国家级媒体都报道了这一研究成果。
- 2020年6月以及9月,我院联合南方产业智库相继发布2019年度以及2020年上半年上市房企健康指数(HFI-60),该指数是以关注和推动行业健康成长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的综合评价指数。
- 2020年8月,广东卫视经济科教频道《南方财经报道》对我院广东千村调查作专题报道,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副教授李书娟、助理教授李承政接受采访。三位受访者分别从精准扶贫、农村养老、人居环境几方面阐述了千村调查研究报告中的发现。
- 2020年11月,我院副院长、副教授张思思受聘为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四届委员。
- 2020年12月,我院顺利举办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政策论坛,这是我院首次举办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政策论坛。
- 2020年底,我院冯帅章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完成的政策报告《广东省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荣获2020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一等奖。

研究团队

中心负责人



冯帅章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政策中心主任,教授
康奈尔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



卢晶亮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

特聘研究员



韩嘉玲

特聘研究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研究领域:农村教育,妇女与发展,人口迁徙,流动儿童教育等

专职研究员



韩昱洁
助理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农业经济学



李承政
助理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农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李书娟
副教授

中山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唐高洁
助理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

兼职研究员



薄诗雨
副教授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蔡澍
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陈思宇
助理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金融经济学



崔潇濛
副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谷佳家
助理教授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金濬熒
助理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



李润梁
助理教授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金融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李绍腾
助理教授

加拿大皇后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金融经济学



林威
助理教授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刘丛
助理教授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经济史，发展经济学



刘珂
助理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博弈论



刘诗濛
助理教授

美国雪城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唐曲
助理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产业组织



马森
助理教授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王曦
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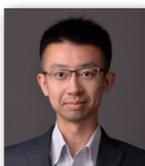
邱筠
助理教授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



王武毅
副教授

新加坡管理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



史炜
副教授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谢斌
助理教授

美国罗格斯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经济史



宋彦
助理教授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谢佳欣
助理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苏应俊
副教授

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



徐吉良
教授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唐立鑫
副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薛森
助理教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严子中
助理教授

英国华威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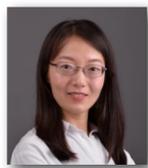
杨尚铭
助理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杨哲
助理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家庭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殷立娟
助理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



张思思
副教授

美国波士顿学院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张毅
助理教授

美国波士顿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



赵胤浩
助理教授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朱宏佳
助理教授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郑立
助理教授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

全职研究助理



葛梦君
研究助理

暨南大学硕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金融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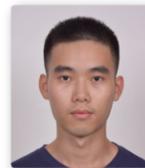
钱文文
研究助理

暨南大学学士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谢慧如
研究助理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余家庆
研究助理

中山大学硕士
研究领域：经济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张亚楠
研究助理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
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变迁、贫困治理



智库研究

基于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和国际水准的高水平论文，针对当下社会热点，聚焦民生领域，形成专业的智库观点、政策简报、调查报告等，为公众提供专业、客观的政策解读。

1

经济抗“疫”

2020年初，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我院教师从经济学的专业角度，产出了一系列优质成果。史伟、邱筠与美国耶鲁大学陈希合作的论文“Impa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China”“被人口经济学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接受发表。该文研究了我国的防控政策如何遏制了由人口流动产生的疫情扩散，对其他国家应对当前疫情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环球时报》、环球网、新华网、人民网等权威媒体报道了论文研究成果。论文发现，截至2月29日，在中国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有效避免了140万以上的新增感染者和超过5.6万人的死亡。论文提到，此次全球各国应对新冠疫情可主要分为两种基本策略，一种策略致力于减轻但不一定阻止病毒传播，另一种策略则依靠更严格的措施来抑制和扭转病毒感染的增长轨迹。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国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后一种策略。



除此之外，我院联合经济学院，产出了一系列政策简报、媒体评论文章等优质成果。内容涉及疫后复工复产、产业复苏、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

经济抗“疫”领域相关成果



- | | |
|-------------|--|
| 学术论文 | Impa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China |
| 政策简报 | 疫情对广东省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及对策 |
| 政策简报 |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助力农村新冠疫情防控 |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 疫后楼市出现明显分化 |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 “新基建”推进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 以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来应对经济困境 |
| 观点评论 | 人口流动大数据对疫情防控的启示 |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 守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 |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 疫情对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的影响 |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 新冠疫情期间网络教学效果如何 |
| 媒体报道 | 专家热议发展新就业形态 |
| 观点评论 | 今天你“团菜”了吗？“封城”下的社区团购新零售模式 |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 建议政府给企业发放就业补贴，鼓励企业与员工共克时艰 |

2

乡村振兴

为响应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全面了解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及农民生活现状，科学评估支农惠农相关政策的初步效果，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乡村振兴方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政策研究院连续两年开展广东千村调查，基于村级和户级层面的调查数据，围绕精准扶贫、农村教育、农村生态环境、乡村基层治理、农村金融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学术及政策研究。

2020年2月，《广东千村调查2019年研究报告》正式发布。在完整报告基础之上，另形成6份政策简报。此外，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与澎湃新闻合作，授权其连载相关研究成果，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同时，广东卫视经济科教频道《南方财经报道》对我院广东千村调查作专题报道，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副教授李书娟、助理教授李承政接受采访。三位受访者分别从精准扶贫、农村养老、人居环境几方面阐述了千村调查研究报告中的发现。



乡愁

3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

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的留守儿童问题早已引起政府关注。2020年11月，由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和我院合作开展的2020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以下简称“绵竹项目”）在绵竹当地18所小学和11所初中顺利开展入校调研和数据收集工作。该项目研究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并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供科学的实证证据。项目参与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19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及美国知名智库 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 研究员 Tim Kautz。



流动儿童在城市中面临的最主要困境是教育问题。我院积极探究探究流动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对流动儿童的学习成绩、社会融入、情感等短期影响，追踪政策对升学、健康和就业的长期影响。2020年4月，我院连续第四次主办“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邀请政府、学术机构、公益机构等专家、学者共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发展大计，该会议为线上举办。2020年底，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编写、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政策研究院讲座教授韩嘉玲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正式发布，我院冯帅章、韩昱洁、余家庆三位老师皆参与该书写作。该书力图呈现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下所面对的挑战和可行的解决路径，围绕流动儿童群体生存现状、发展特征、入学政策、升学政策等问题，呈现了流动儿童教育的现状，比较了各地政策的友好程度差异，分析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特别关注了回流儿童、再迁儿童等儿童群体的教育，并通过对地方案例和社会力量的教育实践的梳理，展现了我国流动儿童教育的新动态。

乡村振兴领域相关成果

- 学术论文 Beyond Yield Response: Weather Shocks and Crop Abandonment
- 书籍 《气候冲击对中国县级经济的影响研究》
- 调查报告 《广东千村调查2019年研究报告》
- 政策简报 《广东农村“厕所革命”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 政策简报 《落实农村党建工作，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 政策简报 《慎终如始攻坚克难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 政策简报 《提质增量：推进广东农村学前教育进一步普及》
- 政策简报 《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应对农村养老难题》
- 政策简报 《妥善处理我国农村非正规跨境婚姻的社会救助问题》
- 政策简报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助力农村新冠疫情防控》
- 政策简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广东“三清三拆三整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政策简报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财政保障机制》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领域相关成果

- 学术论文 Estimat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Schooling Reform
- 学术论文 The Effect of Primary School Type on the High School Opportunitie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 书籍 《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2019-2020)》
- 观点评论/媒体报道 《离城不回乡：超大城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选择》
- 观点评论/媒体报道 《当讨论留守儿童时，我们说的是谁》
- 观点评论/媒体报道 《三成村庄有公立幼儿园，低龄留守儿相对多》
- 媒体报道 《那些待解的流动儿童教育难题》
- 媒体报道 《流动儿童与教育》
- 会议纪要 《疫情之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第四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主题发言摘编



4

流动人口

中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引发的人口流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我院研究团队深度探析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同地区人口政策如户籍制度的影响机制等实际问题，并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与中等收入陷阱”等课题，研究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口政策发挥的影响以及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面临的各类人口问题。同时，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和“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搜集城乡流动人口的基本人口特征、健康、教育、就业、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收支、居住条件和老家信息，分析城乡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就业、劳动力市场以及居住情况的影响因素，从而了解促进其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



流动人口领域相关成果

5

区域发展与住房政策

我院研究团队积极对房地产市场最新政策变化进行及时解读，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研究住房金融政策发展，用房地产真实交易数据构造同质住房指数研究房价波动，并研究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和住房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及个体行为的影响。结合人口城镇化，研究推进农民工和农民进城购房安居相关政策。住房政策研究获得国家及广东省多项课题资助。



区域发展与住房政策领域相关成果



- 学术论文 Migration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Credit Access in China
- 学术论文 Impa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China
- 学术论文 Social Networks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 Experience
- 政策简报 妥善处理我国农村非正规跨境婚姻的社会救助问题
- 政策简报 关注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隐形影响
- 媒体报道(环球时报英文版) Easing constraints of foreign spouses can help solve gender imbalance, but risks, uncertainties remain
- 观点评论 重视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医疗保障水平

- 学术论文 Can Price Regulation Increase Land-Use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al Land Market
- 横向课题 2019-2020 年度上市房企健康指数
- 政策简报 疫情对广东省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及对策
- 观点评论/媒体报道 城市产业的就业扩张如何影响收入代际流动
- 观点评论/媒体报道 广州体育设施调研:距离社区和单位越近,居民锻炼越多吗
- 观点评论/媒体报道 楼市U型反弹企业健康承压
- 观点评论/媒体报道 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产业“双循环”
- 观点评论/媒体报道 疫后楼市出现明显分化
- 观点评论/媒体报道 亏钱的长租公寓怎样才能赚到钱
- 媒体报道 变迁的菜市场如何转型?



6 e

其他民生领域

作为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团队重点关注民生领域的热点问题。例如人力资本投资、新就业形态、低保人群保障、教育公平、家庭与婚姻等。在各种民生领域都产出了大量优质成果。



其他民生领域相关成果

- 横向课题 中国灵活就业报告
- 横向课题 《中国城镇就业质量指数研究》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关于国人的收入状况，我们了解多少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继续大力扶持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性别失衡能否促进女性地位上升？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深圳真的爆发“离婚潮”了吗？专家这样解读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外国人永居管理条例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互惠
- 观点评论 / 媒体报道 有关计划生育的五个“错误”认知
- 观点评论 建议政府给企业发放就业补贴，鼓励企业与员工共克时艰
- 观点评论 女性高学历真的是低婚育率的“罪魁祸首”吗？对性别刻板印象说不
- 观点评论 生育与入学时机选择对个人成就的影响
- 观点评论 生育与入学时机选择对个人成就的影响
- 观点评论 高考录取平行志愿取代梯度志愿，是一种进步吗？
- 观点评论 决定你高考分数的可能还有温度和空气污染
- 观点评论 网络购物能降低区域消费不平等吗？



IES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



政策咨询

积极对接国家部委以及广东省的政策咨询需求，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国家部委，广东省委改革办、民政厅以及广州市政府展开深度合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产出多项具有政策价值的课题成果。

与国家民政部、广东省民政厅合作关注民生问题

作为民政部在华南地区的唯一一家政策理论基地，我院积极在民政事业发展中建言献策。2020年，由广东省民政厅委托，我院冯帅章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完成的政策报告《广东省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荣获2020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一等奖。研究团队还包括：唐高洁、余家庆、葛梦君、张亚楠、谢慧如。项目组通过总结相关文献、非结构化个案深访、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重点介绍了广东婚俗文化、广东婚姻市场现状和当前各地的婚俗改革举措，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此外，针对民生类热点问题，研究院也及时递交多份政策简报和基地专报至民政部。



与智联招聘合作关注新就业形态及灵活就业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爆发对我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了全方位的冲击。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国内外风险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尤其是稳定就业、防范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是当前政府工作面临的重点挑战。近年来，新业态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规模的扩大，带动了商品生产、流通和销售环节的就业，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取、开展、完成工作的新型灵活就业形式开始成为生产组织与就业的普遍形式。研究团队与国内知名在线招聘平台“智联招聘”合作，基于其数据分析了我国的灵活就业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为住房管理部门提供房地产政策咨询，与权威媒体联合发布房地产指数报告

2020年11月，近日，广州市政府召开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四届七次会议。会上，我院副院长、副教授张思思受聘为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四届委员。由冯帅章教授、张思思副教授带头完成的关于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与广州应对策略研究报告也于2020年顺利结项。此外，张思思副教授团队联合南方产业智库发布了2019年度上市房企健康指数（HFI-60）以及2020年上半年上市房企健康指数（HFI-60），该指数是以关注和推动行业健康成长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的综合评价指数。



2020 年自媒体发表

“黄埔大道西观点”推送图文消息共 **144** 条

平台粉丝比上一年度增长近 **60%**

观点评论文章发表 **90** 篇

2020 年权威媒体报道

权威媒体共发布教师观点文章共 **32** 篇。

接受权威媒体采访共 **11** 次。

政策传播



研究院智库微信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发声平台，拥有国际视野、实证基础以及政策导向，为公众提供专业、丰富、客观的优质观点和智库产品。



2020年 权威媒体共发布教师观点文章共 32 篇



评论 south review weekly 新时代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新挑战



国际研究：中国防控措施有效减缓了新冠病毒传播

国务院参事室 中央文史研究馆 主办 创是 咨询 内部参阅 GUOSHI



08 早茶 小学生托管机构 怎样才能不“脱管”

【思·享】韩昱洁：重视提高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医疗保障水平

B02 远见 周刊 眼界 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印发 专家热议发展新就业形态

12 今日人物·调查 变迁的菜市场 疫情加速消费习惯改变 专家建议转型要找准差异

广东千村调查 冯帅章：走千村访万户 用数据支撑精准扶贫

农民工从农村老家到城市务工。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长0.6%，增加184万人

财经网 杂志 CALING.COM.CN 城市拆迁补偿困境

GLOBAL TIMES Easing constraints of foreign spouses can help solve gender imbalance, but risks, uncertainties remain

调查：新冠疫情期间网络教学效果如何

李承政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财经网 杂志 CALING.COM.CN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冯帅章：“折旧率”低 回报率“高” 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财经网 杂志 CALING.COM.CN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第二届“布鲁金斯-暨南”中国微观经济政策论坛

疫情产业影响 | 疫后楼市出现明显分化

广东千村调查① | 三成村庄有公办幼儿园，低龄留守儿童相对多

财经网 杂志 CALING.COM.CN 以房养老老在何处?

财经网 杂志 CALING.COM.CN 以房养老老在何处?

【澎湃】冯帅章：以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来应对经济困境

作者：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教授）



近日，“新基建”成为我国经济领域重要的高频词，各地也陆续公布了与“新基建”相关的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计划投资体量已超40万亿。“新基建”主要是指包括5G基建、特高压等七大板块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铁公鸡”的老基建，新基建有其优越性和必要性，但还是属于物质资本的范畴。为了充分应对疫情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产生的长期不利影响，需要同时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面对本轮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提出加快推动“新基建”建设可以提振信心，对于壮大新兴产业，激发经济增长潜能，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而言有重要意义。

然而仅仅投资于“新基建”为代表的物质资本，可能很难避免当年“四万亿”所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物”与“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既投资于物，也投资于“人”。

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正当其时

从短期来看，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可以达到与其他刺激计划类似的效果，提振信心，从需求侧稳定经济形势。更进一步，相较于其他刺激计划，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来看具有以下几点独特优势。

首先，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收益时间长。根据目前的文献，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平均在10%左右，这还不包括人才聚集产生的正外部性。大规模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不会产生物质资本投资常见的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相反，人才的聚集可以产生积聚效应，进一步促进生产率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使被投资人终身受益，还可以通过代际传递使后代受益。

其次，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一方面，诸如“新基建”之类的投资项目必然催生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投资于高技能人才，可以导致企业采用更加技能偏好型的技术，从而内生地引起产业转型与技术进步。笔者与合作者针对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的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增加了高技能人才的供给，从而使得企业更多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及进行研发活动。

再者，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一石三鸟”。人力资本投资既是应对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好方法，又能对付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低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的“灰犀牛”。良好教育投资可以在短期创造高需求，以减轻新冠疫情导致的短期经济下行压力。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可以缓解人口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我国在面临“人口红利”消退挑战下提高人口质量的应有之义。

最后，针对弱势群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能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在中国，由于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造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子女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2015年，全国0-17岁流动儿童规模3426万人，留守儿童规模6877万人，流动人口子女总数1.03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38%。也就是

说，中国每10名儿童中就有约4名为流动人口子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儿童大多面临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投资这些弱势儿童的早期发展，将既能产生高水平的教育回报以提高投资的效率，又能通过减少教育不平等及长期的收入不平等从而兼顾公平。

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那么，如何围绕走出疫情不利影响，在新一轮投资中，不仅做好“新基建”等物资资本的投资，而且兼顾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呢？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力：

第一，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力度。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儿童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其余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因此公共财政应该在儿童的早期人力资本发展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但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学前教育经费只占总的教育经费的8%左右，幼儿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在各级教育中最低，甚至不到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30%，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财政支出尚处于基本空白的状态。因此，政府应当增加对学前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总量，逐步填补对0-3岁婴幼儿的公共教育服务的空白。

政府投资还应兼顾不同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2018年民办幼儿园占幼儿园总数的62.2%，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全国在园幼儿总数的56.7%。然而，在这次疫情冲击下，推迟幼儿园开学对许多“自负盈亏”的民办幼儿园造成了经营困难，使它们“活下来”都成了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补助、硬件提升、人力培训等多种方式支持民办幼儿园和民办托育机构的生存与发展。

第二，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和更高质量教育。流动儿童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但他们在城市教育体系里却面临重重困难，无法与当地户籍儿童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2016年，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比例为79.5%，还有近300万名流动儿童只能进入面向流动儿童的较低质量的民办学校。流入地政府可以通过大力兴办新的公办中

小校，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公办学位。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提高对就读民办中小学校的流动儿童的支持补贴力度。由于公办学校的生均经费较高，通过补贴民办学校提高流动儿童受教育质量是一个比开发公办学校更加经济的做法。例如，上海市政府从2008年起对民办小学补贴生均经费，全面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且将生均经费补贴从每年2000元逐步提高到目前的7000元左右。笔者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可能对于民办小学的教学质量改善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从2010年到2012年，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的数学成绩差距缩小了超过一半。

第三，提高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支出。农村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生人数看，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分别为9483万人和1243万人，占总体在校学生的65.4%和52.35%。然而，城乡地区间教育水平差异依旧较大。有学者测算，城乡地区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了近35%，严重加剧了社会中的不平等。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正是影响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2017年农村普通初中和小学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依次为1.46万元和1.05万元，虽然都较以前年份有增长，但依旧分别比全国平均支出水平1.64万元和1.13万元低。对此，政府应当提高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支出水平，例如提高农村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师资等方面的投入。不仅如此，还需要重点关注农村教育中的庞大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减缓特殊的成长经历对他们人力资本积累上的负面影响，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

第四，打造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人工智能、数字技术，5G技术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同时也意味着未来就业市场对相关技能人才队伍的需求。例如，根据教育部、人社部和工信部联合预测，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在2025年的职业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然而，中国职业院校的数量和入学人数还较少，投入经费占比小。2017年，全国共有中等

职业院校 1.07 万所，在校生 1593 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 40% 左右，而高等教育中的职业院校和在校生的占比则更小。同年，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2463 亿元，占全国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34%，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总投

入为 2150 亿元，甚至不到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20%。对此，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职业教育，例如提高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加强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为满足今后的新型就业市场需求加快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

【澎湃】刘诗濛：疫情对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的影响

作者：刘诗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 月初到 2 月中旬，正是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期间每天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与疑似病例都在几千人。据证券时报报道（<http://news.stcn.com/2020/0221/15654263.shtml>），2 月 9 日—2 月 16 日的一周内，武汉搜索“股票开户”的人排名全国第一。而此前，即 1 月 29 日—2 月 5 日，武汉该项搜索排名仅位列全国第八。

为什么疫情越严重，人们的炒股热情越高？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启动“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及影响”专项应急项目，鼓励围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应对、治理机制、经济影响及社会管理等方向，开展国家级别的研究项目。本文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与经济学思考，探讨此次疫情对中国国民的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可能产生的影响。

造成武汉地区民众普遍对股票开户兴趣大幅度提升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比较直接，在疫情特殊时期，最普遍的应对措施是隔离。而武汉作为中国抗疫的最前线，基本家家都处在隔离状态。由此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民众在居家过程中，网络线上活动时间大幅度增加，其中包括线上游戏与炒股等活动。2 月 6 日，北京商报报道（<http://www.bbtnews.com.cn/2020/0227/338424.shtml>），手游《王者荣耀》疫情期间创下日流水 20 亿的纪录，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现象。因此，武汉作为大规模隔离区，大家将精力转移线上，入市炒股意愿会普遍增强。

而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疫情对于民众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的直接影响。作为一次全国性的灾害事件，新冠疫情除了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之外，另外一个重大社会影响在于改变了中国国民价值观与风险偏好。上述新闻也是此次新冠疫情对于中国国民的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具有重要影响的直接证据之一。而在经济学与社会学文献中，亦有很多研究发现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或个人苦难经历等均对人类的行为与思想有重要影响。

根据对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的了解，疫情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而根据受影响层次的不同，疫情对民众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的影响也不同。

这个层次的划分跟民众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深浅或所受苦难大小有关。从第一个层次上讲，中国大部分的居民在此次疫情中没有受到直接而严重的伤害，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影响，同时经受了较大的精神压力。我们认为，那些因为疫情而使经济利益受损的民众，家人或自己染病但病情较轻且康复过程顺利的民众，都属于这个层次。

在经济学文献中，有研究分析了这个层次的苦难会如何影响民众的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一篇发表在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城市经济学杂志》）上的经济学论文（<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4119019300956>）（Fan; 2020）发现，在早年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艰苦的民众会在投资行为上更加保守，对风险的承受意愿更低。同时他们更倾向于购买短期消费品，不那么愿意购买房屋等长期消费品，也不那么愿意做长期投资。其主要影响机制是，这部分民众的风险偏好与生活习惯由于其早期经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更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

此外，一篇发表在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学季刊》）上的经济学论文（<https://academic.oup.com/qje/article/126/1/373/1901343>）（Malmendier, Nagel; 2011）发现，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等特殊时期的民众，在人生会选择更少地去承受风险，选择更为保险与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方式与投资方式。

联系此次疫情，受到此次疫情直接影响与伤害较轻，但经历了较大精神压力的民众很可能在今后的人生中，在投资行为上更为保守，即不那么愿意承受风险，并且可能更倾向于消费而不是长期投资。

同时，尤其需要关注年纪较小的青年与儿童。在人生的早期有了苦难的经历之后，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会更为持久，对人生轨迹与人生观都会有一定的改变。此外，这种大范围群体投资消费行为的改变加总之后，将对长期的宏观经济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另一个层次，则是指家庭或个人生活因为此次疫情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有亲人去世，经历了直接而强烈的精神刺激的民众。这种层次的苦难，可以类比到其它一些较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等给人的行为与精神带来的影响。

一篇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美国经济杂志：应用经济学）上的经济学论文（<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pp.20170048>）（Hanaoka, Shigeoka, Watanabe; 2018）发现，2011 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后，受灾严重地区的民众变得更加愿意承受风险，并且更多的人开始参与酗酒与赌博。此外，男性所受的影响比女性更大，并且这种影响在多年以后依然强烈。一篇发表在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上的经济学论文（<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67268108001741>）（Eckel, El-Gamal, Wilson; 2009）同样发现，直接经历过美国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的美国民众变得更加愿意接受风险。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民众在飓风中受到了强烈的创伤与极大的精神压力导致的。

在此次疫情中身处受灾严重地区的民众，尤其是武汉地区的民众，很多都有亲戚朋友或者社区的人染病的体验，有很多甚至经历过家人染病去世或者自己身染重病的痛苦。受到了这个层次的痛苦与精神刺激的民众，他们的心理状况与生活习惯很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按照所举论文中的发现，他们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偏好于接受风险，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面提到的武汉地区在疫情爆发期间股市开户意愿全国第一的现象。而更为严重者，甚至可能会染上酗酒与赌博等不良习惯。

一国国民的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重大影响。因此，此次疫情之后，我们应当关注此次疫情在这方面的社会影响并有针对性地做善后工作。可以预想，对受影响群众的灾后的心理恢复与帮扶工作应该是国家与社区此后工作的重点之一。

【界面新闻】殷立娟：疫情蔓延下，全球价值链应该重新本国化吗？

作者：殷立娟（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当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美国爆炸性增长之后，从2011年持续被讨论的去全球化议题，再度成为欧美各国政府积极推动的政策方向。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积极引导制造业回国投资，现任特朗普政府更是利用此次疫情对全球化产业链造成影响的机会，顺势推出补贴美国企业回国的政策。

然而，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国内化生产，真的如很多政府和专家所希望的那样，是使各国免受流行病打击的有效策略吗？本文从现有经济研究和历史经验角度阐述这一问题。

短期看，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对于对抗疫情的卫生医疗用品供应仍然至关重要。

新冠疫情爆发和迅速蔓延使全球卫生医疗防疫用品供应链成为焦点。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建议转向国内生产这些医疗必需品。然而，将部分或整个供应链本国化的建议与事实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自从 COVID-19 爆发以来，全球供应链缓解了受感染最严重国家的防疫物资的短缺局面。全球价值链的存在恰恰保证了这些医疗必需品的快速扩产。

美国和欧盟约一半的个人防护用品从中国进口。与2019年相比，2020年1、2月份中国基本个人防护用品的出口下降了15%，这与当时中国国内需求因冠状病毒而飙升有关，然而这一出口的下滑低于同期中国其他出口17%的降幅。自3月起，中国迅速扩大了口罩、医院防护服，甚至呼吸机医疗器械的生产和出口。截至3月底，中国每天生产1.16亿个口罩，是疫情爆发前的12倍（Brown 2020a）。此外，在很短的时间内，世界各地的买家都能从其他非传统出口商那里找到替代供应来源，例如从斯里兰卡和泰国进口手套，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越南进口医院礼服（UN Comtrade 2020）。

其次，从生产和加工角度来看，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短时间大规模增加供应量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全球产业链的存在，使得公司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彼此间更能有效交流知识技术，相互间的协调合作也可以使公司更迅速地了解和更好地遵循各国法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快速弥补市场的短缺，公司间寻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创新现有生产方案，从而扩大生产。比如，为了满足《国防保护法》的要求，美国医疗器械公司 Ventec Life Systems 与通用汽车合作，在8月底前可以生产30000台呼吸机。同样，3M公司与康明斯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其呼吸器开发 HEPA 过滤器（3M 2020、Assis 2020、Cridle 2020）。

对投入的高需求也刺激了新参与者的创新（Chambers 2020）。在这方面，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至关重要。梅赛德斯-奔驰1级方程式车队与伦敦大学学院合作，为批量生产的通风机开发了一种新的设计方案，目前日产量已达1000台，并将其设计（F1 2020）公开采购。英国电器制造商戴森（Dyson）与 TPP（The Phoenix Partnership）合作，在短短10天内设计了一款全新的呼吸机，为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系统（NHS）供货，在新加坡制造汽车（Sajan

2020）。Virgin Orbit 公司是一家航空航天技术公司，开发了一种简单的机械化手动通风机和一个容易生产的泵（Virgin Orbit, 2020年）。

总之全球价值链通常是一种解决办法，而不是危机期间必需品供应的瓶颈。

历史经验表明，在其他非医疗行业，全球价值链在长期具有很强的韧性。

许多企业报告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很多企业的供应链出现了中断。由于政府封锁，国际和国内供应都受到影响。在这方面，新冠疫情更像是一场自然灾害。

2011年，日本和泰国发生了两次重大自然灾害，对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产生了深刻的经济影响，一度引起了人们对供应链弹性需求的关注和研究。

日本大地震是1900年以来世界第四大地震。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价值链上日本企业的韧性相对较强。根据 Inoue 和 Todo（2017）的说法，大多数直接受到地震袭击的核电站在三个月内重新开始活动，其中有广泛供应商网络的公司复苏更快。由于其复杂的供应网络，这些公司最初受到的影响更大，但这些网络在复苏阶段成为它们的优势。他们认为供应链的正面效应通常超过负面效应。

同时，从长期来看，地震后企业改变了采购策略。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受地震影响地区的企业更多地通过离岸外包来应对，这可能意味着一些供应商走向多元化。在汽车行业，Matous 和 Todo（2017）发现，在灾难发生后，制造商已使其供应商多样化，并摆脱了与一线供应商长期的“keiretsu（企业联盟）”模式。

2011年湄南河洪灾冲击了硬盘行业。全球43%的硬盘生产集中在受这场自然灾害影响的湄南河流域。Haraguchi 和 Lall（2015）研究发现，各个厂家所受影响有很大差异。业界领先的美国公司西部数码

（Western Digital），其工厂被淹没，而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希捷（Seagate）的工厂处于同一地区海拔更高的位置，因此受影响较少。日本东芝（Toshiba）的工厂也被淹没，但能够将生产转移到菲律宾。希捷在2011年暂时超越了西方数码，成为硬盘行业龙头。但西方数码只用了六个月就重新夺回市场领先地位。在2011年的洪灾冲击之后，很多学者预计西部数码会选择多样化生产场地，然而西部数码不仅继续在湄南河旁生产，甚至在2017年决定关闭马来西亚的一家工厂，把生产进一步集中在泰国。这突出表明，一些海外工厂为制造企业提供了显著的优势，而重组可能不是企业管理价值链风险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综上，全球供应链是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特征。全球供应链可能会将危机传播到各国（Baldwin 和 Freeman 2020）。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供应链的存在加剧了经济衰退。供应链本国化并不会消除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事实上，脱离全球价值链虽然减弱了对外国投入品的依赖，却会增加对国内投入的依赖。由于任何与流行病相关的国家封锁也会影响国内部门，因此国际供应链的重新本国化通常不会让经济更快地恢复。

陈思宇：女性高学历真的是低婚育率的“罪魁祸首”吗？对性别刻板印象说不

作者：陈思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交锋

一档以展现独立自信女性魅力为内核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频频登上这个夏天的热搜。“不被年龄限制、不被社会规划、不害怕失去未来，在自己的黄金年代，做最好的自己”不仅激励了女性观众，连男性观众都开始了追更之旅，这更说明女性的魅力从来不是由年龄来定义的。

由姐姐们引发的讨论很多，其中两件网络热事曾引发较大关注：“杨丽萍因未生育被网友diss为女性失败范例”，“伊能静评价梅艳芳：事业到顶但一生寻爱终不幸福”。《凤凰周刊》就“生育是否为女性的必选项”发起线上投票，最终“尊重女性生育选择（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想生）”微弱胜出。

虽然线上投票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结论不具备代表性），但笔者认为，这股思潮反映了国人的婚姻观念正朝着多元化、自由化进展，是“个人主义的婚育观”与“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婚育观的激烈碰撞，是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正面反击。

危机

尽管婚育与否是个人的权利，应当被广泛尊重，但低婚育率所引发的潜在社会经济危机，如老龄化加速、劳动力萎缩、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也的确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严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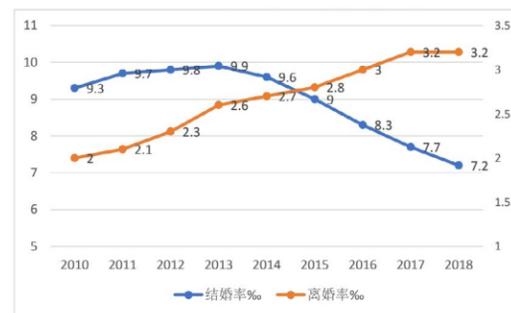


图1 2014-2018年我国结婚率、离婚率趋势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从2014年起，我国结婚率（一年内结婚对数与同期人口总数的比率）持续走低，而离婚率自2003年以来已经连续15年上涨。2018年我国单身人口已经超过两亿，结婚率仅为7.2%，创下了近10年的新低，而最低上海更是仅有4.4%。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东亚和南欧的许多地区亦是如此。2019年韩国粗结婚率（一年中每1000人的婚姻申报数量）仅为4.7%，创1970年有记录以来新低。2000年后，日本的35岁至39岁的单身女性比率已高达约20%；该指标在新加坡则从1980年的8.5%逐年上升到2015年的17%。

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左右（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孩子）。这一生育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根据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预测，我国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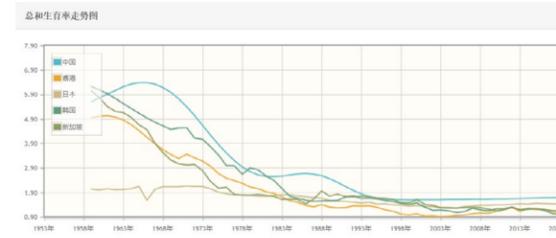


图2 亚洲四国总和生育率趋势图（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低生育率的背后，一个客观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婚人口总数下降。同时，在传统生育文化“养儿防老”的作用下，我国男女比例失衡较为严重。2014年我国总人口性别比是105.06（女性为100），男性总人口数比女性多3376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随着这些年龄段的人口逐渐步入婚育阶段，未来婚姻率将持续走低。

从经济学的角度，结婚与受教育水平直接相关。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拥有高技能的女性更可能从事利润丰厚的职业从而推迟婚姻或者不婚；相反地，低技能女性由于赋闲在家的机会成本较低则更可能进入婚姻的殿堂。

那么，女性不断提高的受教育水平是造成低婚育率的主要推力吗？

偏见

Bertrand, Kamenica 和 Pan (2015) 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期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文章给出了“gender identity（性别刻板印象）”影响女性结婚率及劳动参与率的直接证据。他们利用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及美国普查数据发现：当女性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的50%的时候，即当妻子开始比丈夫赚得多时，结婚率呈现一个急剧的下降，下图断点所示。作者同时发现，在已婚家庭，高学历女性会减少劳动市场参与以及承担更多家务来提高婚姻率、降低离婚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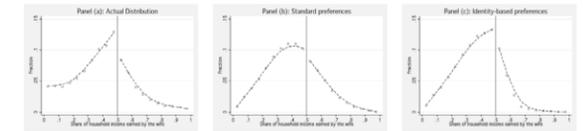


图3: Actual and counterfactual distributions of relative income (US Cens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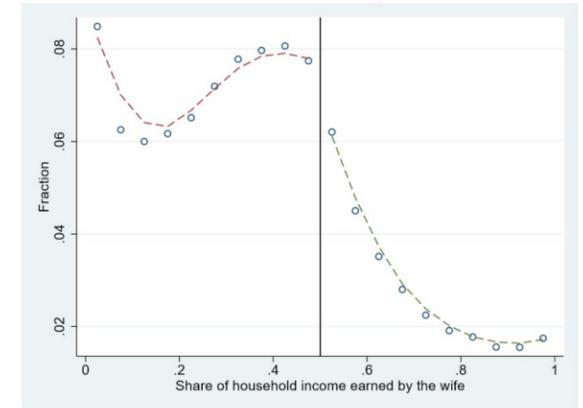


图4: Distribution of relative income(US administrative data), 数据来源: Bertrand, Kamenica和Pan (QJE, 2015)

这一现象实则与传统观念认为丈夫和妻子在家庭扮演什么角色密切相关。“丈夫挣钱养家、妻子照顾家人”或“丈夫一定要赚的比妻子多”的观念在多数家庭仍然根深蒂固。在此背景下，事业型女性常被批评为“自私”或“对家庭需要不负责任”，而丈夫如不能挣钱养家，也常常成为婚姻矛盾的一大根源。

当我们横向比较全球女性婚姻状况时可以发现：虽然低学历女性的结婚率整体高于高学历女性，但在北美、大多数北欧国家和西欧部分地区，这两者的差距正在下降，甚至偶尔出现逆转；然而，这差距在东亚国家和南欧部分地区保持了稳定或呈扩大态势。这表明女性受教育水平对婚姻率的反向影响并不是不可逆，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述的差异呢？

Bertrand, Cortes 和 Pan (2020) 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期刊“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的文章提出上述差异与社会的保守程度有关。

警惕“福利悬崖”，财务公开确保“真”脱贫

作者：唐高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张亚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于2018年发起的“广东千村调查”项目，于2019年7月至8月开展第二轮广东省千村调查，深入广东乡村进行了入村入户调研，课题组从行政村、家户两个层面开展数据收集，使用分层抽样法抽取广东省119个行政村，并对3622户农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调查内容涉及农户的人口特征、收支、生产、就业、以及农村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现状、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承包地及宅基地改革、农村金融改革、乡村教育等方面。澎湃新闻授权刊发部分章节。本文描述了广东农村扶贫现状，贫困户依然存在返贫风险。

截至2018年底，广东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总体实现，92.88%的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80%以上相对贫困村达到出列标准。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精准扶贫战略的现状，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于2019年7月针对全省25个区县进行了第二轮广东千村调查，访问了超过3600户农村家庭。本报告立足于本轮广东千村调查的数据，旨在了解和发现广东精准扶贫的进展及问题，并为当前和下一步缓解相对贫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扶贫资金充分到位

从两个年份的贫困发生率来看，2019年贫困户占所有家庭的比例相对于2018年有所下降。2018年中的非贫困户中仅有1.69%的家庭在2019年成为贫困户；而2018年的贫困户家庭中有超过一半（51.35%）

的家庭在2019年脱贫。在这些脱贫户中，继续接受政府补助的比例为58.44%，西翼地区是脱贫户中继续接受补助比例最高的地区，仍有76.97%的脱贫户继续享受政府补助。从贫困户的动态变化来看，广东省脱贫较为理想显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脱贫不脱政策，摘帽不摘帮扶。



图1：广东省脱贫工作进展

表1 2018-2019年家庭贫困状态转换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户均财政扶贫资金（元）	11051.05	23050.17	3450.33	8154.03	12167.52
户均对口帮扶单位资金（元）	3661.79	1401.69	1510.45	1809.22	10538.16
户均社会捐赠资金（元）	1907.06	296.14	6364.34	282.35	596.43
户均总扶贫资金（元）	16619.90	24748.00	11325.12	10245.60	23302.11
户均实收扶贫资金（元）	3669.84	3631.04	2622.06	5022.62	2726.02
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收益分红的比例 (%)	30.77	13.44	26.28	36.53	44.97

2019年，广东省农村贫困户户均财政扶贫资金为11051元，户均对口帮扶单位资金为3662元，户均社会捐赠资金为1907元，户均总扶贫资金达到16620元。地区间各项扶贫资金表现出较大差异，珠三角地区户均财政扶贫资金最高，达到了23050元；山区的对口帮扶单位资金收入较多，户均超一万元；东翼的社会捐赠资金获得最高，平均每户达6364元。总的来说，珠三角地区的户均总扶贫资金最高，达到户均24748元，超过两倍西翼地区的户均总扶贫资金（10246元）。从省级财政和社会帮助资金来看，广东省对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表现出了极强的支持力度。

他们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以男性是否支持女性追求职业发展为关键因素，探讨发达国家中高技术女性的婚姻前景。具体来说，与低技术女性相比，高技术女性因为工作，较少有时间为家庭（育儿和家务）做贡献，这会降低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收入可以补偿因缺失照顾家庭而造成福祉损失，从而增加她们的婚姻前景。但在保守社会，丈夫对妻子的职业和收入的重视程度较低，他们更喜欢妻子留在家照顾家人，妻子需要极高的工作报酬才能补偿丈夫因妻子工作所带来的损失。

作者使用23个国家的结婚率数据（包括四个时间段：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来检验上述模型。他们重点关注35岁至44岁之间女性的婚姻状况。为了衡量各国性别规范的强弱，他们使用综合价值调查数据（IVS，该数据收集了不同国家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态度），把对以下问题的肯定答案“当就业机会稀少时，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就业权利”视为表达了保守观点，即男性的劳动就业更为重要。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的保守程度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女性的婚姻前景。相对于保守社会，性别平等社会更能接纳女性的进步，更认可女性除了在家还有在社会劳动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从而有利于婚姻率以及生育率的提高。

期待

由此可见，低结婚率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现代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竞争能力的快速发展与性别刻板印象的滞缓改变才是影响当代社会的婚姻选择与劳动力分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当高学历女（潜在高收入）从婚姻中所得甚微，她们很可能推迟甚至放弃婚姻，从而造成了低婚姻率。高教育女性群体结婚率低会转化为生育率下跌，这将加剧本已偏低的生育率。此外，最新研究显示，高教育职业

女性的子女更持有自由开放的社会态度，如果这些群体生育率低，将进一步阻碍社会向更加开放的方向转型。

结婚与否是个人的权利，多元化的社会应当尊重个人的选择。但减少社会刻板印象、推进男女平等的转向会释放出更多的婚姻市场的空间，提高婚育的边际收益，让不少“恐婚”但内心希望夜半归家时有粥可温、有人可依的“被单身群体”回归婚姻市场。

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女性职业地位的整体提升，当面对来自社会刻板印象质疑的时候，勇于说“不”，不畏惧性别与年龄，不设限制，自信与独立地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表2 全省分区域扶贫资金概况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户均财政扶贫资金（元）	11051.05	23050.17	3450.33	8154.03	12167.52
户均对口帮扶单位资金（元）	3661.79	1401.69	1510.45	1809.22	10538.16
户均社会捐赠资金（元）	1907.06	296.14	6364.34	282.35	596.43
户均总扶贫资金（元）	16619.90	24748.00	11325.12	10245.60	23302.11
户均实收扶贫资金（元）	3669.84	3631.04	2622.06	5022.62	2726.02
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收益分红的比例（%）	30.77	13.44	26.28	36.53	44.97

户均收入明显提升，但可能存在“福利悬崖”效应

从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收入对比来看，贫困户与非贫困户 2018 年人均收入均高于省定 4000 元的贫困标准。其中，2018 年和 2019 年均为非贫困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为 11457 元，2018 年和 2019 年均为贫困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为 7602 元。可见，广东省的贫困户收入情况有了显著的好转和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2019 年脱贫的人均收入为四类家庭中最低，甚至低于两年均为贫困户的家庭。这是由于两年均为贫困户的政府转移收入为四类群体中最多（2144 元），而 2019 年脱贫的家庭政府转移收入仅为 779 元。这些转移支付使得两年均为贫困户的家庭与 2019 年脱贫的家庭中存在接近 10% 的收入差，脱贫的福利悬崖效应比较明显。而在剔除政府转移收入后，两年均为贫困户的人均家庭收入便显著低于 2019 年脱贫的家庭。从家庭收入构成来看，两年均为贫困户的家庭相对其他三类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政府转移收入比例较高，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比例较低，显示出这些家庭自立能力较弱。

表3 四类贫困状态家庭收入构成

2018 年	两年均非贫困户	2019 年入贫	2019 年脱贫	两年均为贫困户
人均家庭收入（元）	11456.87	7868.07	6816.45	7602.97
人均家庭收入（除去政府转移收入）（元）	11259.85	6998.73	6037.36	5458.93
收入构成（元）				
农业经营收入	770.67	205.13	303.11	899.10
非农经营收入	1866.71	452.14	479.77	455.17
工资收入	6600.23	4984.08	4112.67	3263.93
财产收入	318.17	53.02	119.80	75.25
非来自政府转移收入	1543.27	1272.96	956.02	705.40
政府转移收入	197.02	869.33	779.10	2144.04

扶贫程序认知有待加强，财务公开未充分到位

干部和群众对政策精准了解、严格执行认定流程，是精准识别贫困户的保证。但从建档立卡户评定的流程和规范来看，村干部和贫困户对于建档立卡户的评定过程都有不清楚、了解错误的情况。

表 4 显示约有 42% 的受访贫困户认为自己是村干部指定成为贫困户，另分别有 9.5% 和 13.6% 的贫困户认为自己是“村民小组评选推荐，村干部指定和“村民小组评选推荐，村干部投票决定”，选择“其他”的 25.4% 的贫困户中有较高比例的受访者认为是“自己申请，上级批准”。

表4 建档立卡户确定方式

建档立卡户确定方式	比例（%）	家庭数
村干部指定	42.01	71
村民小组评选推荐，村干部指定	9.47	16
村民小组评选推荐，村干部投票决定	13.61	23
全体村民投票决定	9.47	16
其他，请说明	25.44	43

干村调查数据对受访村干部关于贫困户认定的询问显示（图 2），全省仍有 12% 的行政村村干部认为本村采用的贫困户认定的收入标准是国家标准 2736 元，存在对精准扶贫政策了解不到位的情况。另外，全省有约 34%、珠三角有 67% 的村庄采用的是市定的更高扶贫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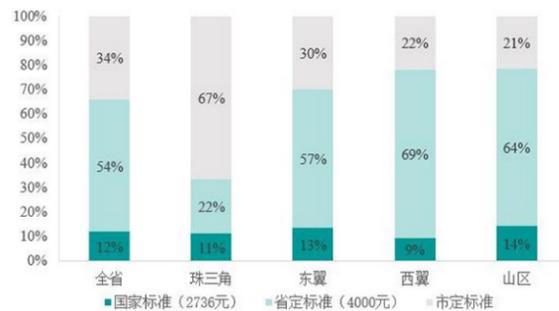


图2 贫困户认定采用的收入标准

2019 年干村调查数据显示，扶贫资金使用情况未做到百分百公示，全省约有 88.14% 的行政村对扶贫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公示。分区域来看，仅西翼地区管理最为到位，其他地方均未做到百分百公示，其中珠三角地区进行公示的行政村比例仅有 73.08%。虽然广东省扶贫办发布的《广东省扶贫开发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明确规定，涉及扶贫资金项目有关信息内容应当主动予以公开，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扶贫资金阳光化行动仍需继续推进。

表5 扶贫资金公示情况

	全省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示的比例（%）	88.14	73.08	84.38	100	92.86

帮扶措施主要用于“输血”而非“造血”

从广东省农户获得各项帮扶的类型来看（表 6），农户获得帮扶类型最多的前三项为：“教育费用减免，学生生活补助”（28.19%）、“医疗救助”（28.19%）、“危房改造”（19.46%），生产补贴和安置就业相对较少。对于发放到农户的扶贫资金，图 3 显示大部分农户将收到的扶贫资金用于生活消费（57.1%）、看病就医（42.3%）和子女教育（34.9%），从农户的使用来看，也主要集中于日常生活而非投入生产。

表6 农户获得各类帮扶类型的比例（多选）

	获得帮扶比例（%）
农林牧渔生产	17.45
农产品加工	1.34
危房改造	19.46
教育费用减免，学生生活补助	28.19
医疗救助	28.19
专业技能培训	6.71
就业辅导	4.03
安置公益性岗位就业	1.34
扶志教育	1.34
其他	12.75
没有获得任何帮扶	3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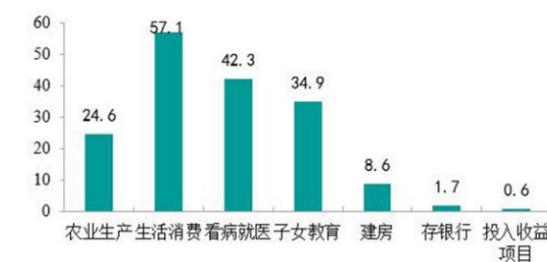


图3 贫困户获得扶贫资金的主要用途（%）

政策建议

一是深入把握政策要点，加强扶贫流程的宣传和公开。对于基层工作人员，要求牢牢把精准扶贫各个环节的政策要领，全面熟悉精准扶贫过程的程序和各项措施，做到程序透明，心中有数。基层政府也要加大对群众的扶贫政策宣传，鼓励群众参与扶贫工作，及时消除群众对扶贫工作中的疑惑和误解。

二是因人施策进行帮扶，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在接下来的扶贫工作中，需要更重视个体贫困的特性和差异性，制定具有个人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帮扶措施，着重于解决贫困户个体最主要的问题，使扶贫效果具有可持续性。

三是严格警惕福利悬崖，严格管理贫困户进出机制。管理部门需要广泛听取基层意见，与研究机构合作制定科学的建档立卡户进退机制，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同时，应重视贫困户的福利叠加问题，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外的边缘贫困人口也应实施一定地帮扶政策，如发动引导社会力量进行帮扶等。

四是不断巩固脱贫成果，建立长效稳定的帮扶机制。在广东完成精准脱贫伟大任务的“后扶贫时代”，政府应该将扶贫工作向常态化、制度化的模式转变，构建多部门协作、社会力量参与的稳定型工作机制。同时，应当充分利用现有基层信息资源，事前监测贫困户和贫困边缘群体的贫困动态变化，做到主动回应贫困对象的需求，严格控制返贫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实现政府工作机制的优化和贫困治理能力的提升。



品牌活动

2020年，研究院继续开展“问政暨南”、“IESR+”等智库品牌活动。此外，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连续第二年开展合作，共同举办“布鲁金斯-暨南中国微观经济政策论坛”；连续第四年举办“全国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首次举办“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政策论坛”。

政策研讨会

► 第四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2020年6月13日-14日，由我院主办的第四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在线上顺利举行。来自哈佛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北德克萨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青草公益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政府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相聚“云端”，与会嘉宾围绕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发展问题展开为期两天的政策论坛与学术报告活动。200余位关注该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在线参会，共同探讨新冠疫情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



疫情背景下我国贫困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发言人：史耀疆（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

史耀疆教授分享了农村婴幼儿早期发展在疫情后可能面临的新的问题。中国目前大约有 1,170 万 0-2 岁留守儿童，超过中国 0-2 岁儿童的四分之一（UNICEF, 2014）。在疫情以后，部分流动人口被隔离，导致他们的婴幼儿子女缺少照顾。虽然在疫情期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文件要保障这类儿童的关爱照顾，但是，父母外出对婴幼儿究竟带来怎样的效应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母亲外出务工的情况越来越多。目前，学界尚没有形成母亲外出务工对孩子产生影响的共识，但根据一些研究表明，0-3 岁的孩子在缺乏父母的陪伴下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身心健康以及社会情感发展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的研究也表明，0-3 岁是对孩子早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最高的一个时期。根据史耀疆教授团队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农村有大量 0-3 岁的孩子是处在缺乏母亲照顾的状态，这些孩子存在认知滞后、语言滞后、社会情感发育滞后的问题，因此，母亲外出打工会对孩子的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母亲的外出务工能够为家庭带来正向的收入效应，但在疫情的影响下，母亲的外出务工收入可能会降低，因此收入效应减弱；同时，母亲外出务工使他们对子女的照顾陪伴效应减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有效的提升农村人口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史耀疆教授建议实施一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让农村母亲能够留在家陪伴婴幼儿。

疫情冲击下再谈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问题

发言人：吴开俊（广州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

吴开俊教授针对广东省农民工随迁子女集中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和惠州七个珠三角城市，报告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问题。

首先，相比京津冀和长三角的随迁子女集中城市，这七个珠三角城市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在财政投入的努力系数、“入读公办学校”学生总量、与父母“在一起”指数等指标都比较靠前。从经费投入的角度看，珠三角城市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主体责任在市级财政（包括区/县），合计承担的比例均在 97.83% 左右，而中央和省财政合计承担比例几乎没超过 3%。

其次，吴开俊分享了对未入读公办学校的随迁子女进行不同水平的生均经费补贴，这七个城市的经费缺口的大小。他们发现，如果通过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方式来补贴生均经费，广州、佛山和中山的经费缺口总计 25.15 亿，而深圳、东莞、珠海、惠州四个城市的总和经费缺口有 77.69 亿。

最后，面对这些经费缺口，报告中建议依据不同城市的财政负担情况，调整地方、省财政、中央财政的分担比例。广州、佛山和中山的教育经费由市级（包括区/县）财政自己承担。而其余四市的缺口过大，应由更高级别的省财政和中央财政进行分担，例如省财政负担比例上升至 20%，中央财政约为 5%。

疫情冲击下的流动儿童中考困境

发言人：向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讲师，青草公益联合发起人、理事长）

向芯博士以广州为例，详细阐述了当前流动儿童面临的初中毕业后的升学问题。青草公益的调研团队跟踪广州异地中考政策的变迁。2014 年正式推出异地中考政策提高了非户籍生考公办普通高中的门槛，且压缩了公办普高开放给非本地户籍学生的学位数量和比例。根据向芯团队的估算，2018 年，广州非本地户籍考生被

公办普高录取几率仅有本地户籍考生的五分之一左右。

其次，向芯根据青草公益 2018-2020 年间的田野调查资料，将流动儿童入学的初中根据生源类型和升学引导策略分为“中考至上”、“系统分流”、“中考无望”三类，并发现不同类型的学校对学生参加中考的引导策略不同。他们还发现，由于流动儿童面临的系统性的升学壁垒，很多学校里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早就确定了读高中是没有希望的，向芯团队借用人类学理论中的阈限（liminality）的概念来形容这些学生所处的状态：主流的考试升学目标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但又还没有其他有说服力的目标和框架指引他们当下的生活，于是许多学生沉迷于娱乐，在家长、老师看来好像不求上进。

疫情的冲击对处于“中考导向”和“过渡空间”的学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疫情导致的中考时间不确定和线上学习效果不佳让“中考导向”的学生和家长更加焦虑；而处于“过渡空间”的学生则被从对他们无意义的课堂学习中解放了，他们中有的更加沉迷于游戏、刷视频，但也有一部分同学利用了这段时间学习新技能、尝试做微商，从而丰富了对自身未来职业发展的想象。

向芯最后总结了当前政策与实践面临的挑战。如何推动提高甚至取消非户籍生学位限额、如何帮助提前被判定为上普高无望的初中学生提前积极主动地探索未来出路，以及如何改善中职教育和改变社会对中职的歧视是当前政策与实践面临的三大挑战。

跨界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组织参与的多重困境及其超越——对长三角流动儿童教育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实践的考察

发言人：刘玉照（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刘玉照教授与王元腾博士基于对长三角流动儿童教育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实践的考察，首先分析了跨界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社会组织所面临的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是“跨区域”的儿童服务提供，存在衔接与协同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跨领域”，社会组织“独立自主、公益追求”的实践取向与政府“有意控制”及市场“牟利取向”存在张力。

其次，他们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为了超越当前所面临的参与困境，社会组织在以下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社会组织在“跨区域”中充当了“网络链接”的角色。一是通过搭建中介桥梁，以民间性非正式组织身份嫁接起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间的沟通渠道；二是打造资源链接平台，增加了社会组织间的沟通交流机会，加强稳定合作。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跨领域”中扮演了“缝隙粘合”的角色。一是转化政府资源，构造均衡点；二是面对社会组织牟利的质疑，主动切割市场和公益服务领域以强调公益价值追求；三是构造多元化组织身份，多方动员企业、政府资源。这些举措消弭了社会组织与市场、政府间的张力。

打工妈妈互助积分入学探索

发言人：黄励（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发展部总监）

广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负责人黄励分享了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在广州打工社区中组织打工妈妈就积分入学入户政策进行互助的一些探索经验。黄励的团队走访发现，积分入学入户政策有助于外来务工家庭获得公共福利和教育公平，但由于家长们不了解政策、看不懂政策细则、申请过程麻烦等原因阻碍这些家庭享受积分入学的机会。通过组织打工妈妈进行积分入学政策互助，以宣讲会、线上微信群等互助形式介绍积分入学政策内容和分享成功家庭经验将有助于这些外来务工家庭克服障碍，获得社会支持，扩大积分入学政策的实际受益面。

近期关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一些焦点问题

发言人：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陆铭教授分享了疫情影响下关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五个看法。其一，本次新冠疫情主要影响了大量农民工就业的服务业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造成了大量农民工失业、社保断缴、在城市的居住中断。因为这些原因，他们的随迁子女可能将不符合流入地城市的入学条件。

其二，陆铭教授认为，不能因为本次疫情从武汉开始爆发，就认为疫情与城市规模有关，从而反对城市化和大城市发展。

其三，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高中教育问题，我们需要有前瞻性。一旦高中教育进入到普及阶段之后，在流动人口众多的特大城市将急剧增长对高中教育资源的需求。

其四，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得到重视。在《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的出台下，中国的特大城市发展可能会为了抢占国际人才降低外国人永久居留的门槛。因此，我国可能出现流动人口获得大城市户籍的门槛高过外国人永久居留的门槛的情况，这个矛盾需要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

其五，陆铭教授建议未来柔性处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权力。例如，针对部分出生和生活一直在当地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他建议从城市的人文关怀和公平角度，考虑他们的入学需求，适当降低入学门槛。

疫情期间的流动儿童教育

发言人：陈媛媛（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陈媛媛教授基于上海流动儿童跟踪调查数据分享了疫情期间流动儿童教育的最新状况。首先，报告指出，2014年以来，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导致北京和上海的流动儿童入学率下降。根据上海的调研数据，2015年起，市区公办学校内流动儿童比例逐渐下降；郊区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比例在2015-2018年下降，2019年后有所回升；郊区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招生人数下降，同年级学生转出率上升。2019年后招生人数有所上升，但学校之间差异很大。

其次，报告调研发现，疫情期间，流动儿童转学率显著增加，尤其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主要原因包括家长因疫情离开上海，返回原籍地工作；有些学生留在原籍，因为原籍的学校开学更早。

报告进一步指出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疫情期间遇到的四点困难：返校率下降，生源减少，生均经费下降，导致学校财务困难；教师工资水平低，师资不足；疫情

防控的人力、财力和场地资源不足；学生返校和上下学增加了疫情防控难度。

最后，报告总结了流动儿童疫情期间的学习情况：流动儿童学习的设备条件受限，很多仍然在农村，没有网络；家长教育水平较低，无法辅导；线上的教学效果打折扣；复课后有些学生无法返学。

疫情下的上海随迁子女学校近况

发言人：周纪平（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前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

周纪平会长先介绍上海随迁子女学校的数量变化，在最多的时候大约在160所左右，但近几年随着城市人口管控相关政策，上海市采取公办为主的管理的办法，逐渐压缩民办随迁子女学校，到现在仅剩64所，今年还将关闭一些。接着他分析了疫情下上海随迁子女学校的近况：首先，因疫情原因，学生流向发生变化。年初，不少随迁学生随父母返回老家过年，在疫情发生后，一部分选择留在老家后，父母在当地就近务工，不再返沪。人数不是很多，但各镇情况有所不同，有的接近百分之五十。返沪未返校继续在家上网课也有一部分，尤其是即将关停的学校受影响更大，家长对学校缺乏信任感。年度考核对学校关停有直接影响，不能达标的学校当即取消下一年度的招生指标计划；由于生源减少，获得的经费补助减少，这更加剧了教学人员流失，迫使学校关停。第二，教育行政部门将随迁子女学校的教师培训纳入全市学校教师培训体系，并依相同考核标准要求学校，这对于随迁子女学校有利，但也加大了压力。第三，疫情期间NGO组织针对随迁子女开展了不少社会服务。例如开展家长网络教育讲座、资助困难学生饮食等。最后，随迁学校经费紧张，仍是当前主要问题。优秀教师留不住，随迁子女学校运营难度大。五个区中虽然有两个区已将生均经费提升到每人每年7000元，但另外三个区仍然维持在6000元。希望政府加大随迁子女学校的经费投入和扶持力度，保证学校良性运作。

抗疫的困顿与磨练——以上海和杭州两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为例

发言人：陆建非（上海师范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陆建非教授分享了他观察到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新冠疫情下面临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和管理上的困顿的磨练。首先他谈及了他在疫情期间到访过的位于杭州余杭区和上海宝山区的两所学校。通过对学校情况的调查和分析，他发现几点现状：第一，网课的质量不高；第二，线上学习环境不好；第三，抗疫现状不容乐观；第四，两所学校的经济状况比较乐观。根据这种现状，他进一步从心理、经济和管理三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困顿和磨练。

随后，陆建非提到，本次疫情更加凸显了流动人口所面临的问题，例如流动人口群体的边缘化、健康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保护危机。同时，本次疫情也给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进程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尤其是打破了扶贫的节奏。

最后，陆建非认为要关注、关心、关爱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一定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不断提高它们在抗疫磨练当中的生存能力，使得民工子女学校能够长久有耐力地发展。

强化学校健康教育，提升流动人口子女应对疫情能力

发言人：冯文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冯文猛的报告主要围绕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健康教育展开。报告指出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根本需以预防为主，因此，以学校为基础进行的一系列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以增进学生及学校全体人员健康为目的的学校健康教育十分重要。教育内容包括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和公共卫生意识，掌握知识技能，减少危险因素影响。

首先，报告梳理了国际上学校健康教育的有关做法，主要以立法推动为主。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新加坡、日本和英国等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设立国家健康教育相关法律条文。

其次，报告指出我国学校健康教育发展的制度政策在不断推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目前我国健康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政策包括综合性政策，例如《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等，以及和以特定疾病防控为目的的专项教育政策，例如《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等。当前，几乎全国所有学校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学校健康教育活动。

最后，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学校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为四点：健康教育政策体系不完善，部门协作性欠缺；学校开展健康教育动力不足；健康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学校开展健康教育能力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提出了应对性的政策建议。

线上教育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影响

发言人：唐晓杰（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受疫情的影响的停课不停学是中国最大规模的线上教育的实验，线上教育对流动人口子女到底有什么影响，是唐晓杰所关注的主题。

唐晓杰首先介绍了近几年上海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基本情况：总量基本稳定，但是近年来随迁子女学校及其学生数量越来越少，主要由公办学校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

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育虽然受到很多的认可，但唐晓杰认为：虽然流动人口子女能够接受线上教育，能够享受线上优质资源，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可能受到制约，比如电子设备的获取，家庭的环境，课本教材的到位率和师生互动的平台等方面。

最后，唐晓杰针对“搞好线上教育要覆盖全体学生，尤其能够对流动人口的子女，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所谓优质教育”这一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加强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二是要加强电子教材电子课本的配套。三是要监控技术带来的风险。四是要加强教师的线上教学能力。

▶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政策论坛



2020年12月10日上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金融政策论坛在曾宪梓科学馆406室顺利举办。本次会议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主办，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金融学院、中大咨询研究院以及暨南大学的优秀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大湾区经济金融发展大计。

如何通过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发言人：林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江指出，新形势下需要构建国际国内循环新发展

格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为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为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规律和世界经济开放新趋势，我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当下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作用。

如何理解“双循环格局”？林江教授指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参与国际大循环为我国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弥补国内要素短缺、吸引国际先进生产经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对内需的依赖度逐步增强，外贸“大进大出”的格局逐渐改变。换言之，我国需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升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大循环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林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最佳制度创新和实践，在双循环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节点枢纽角色。粤港澳大湾区在政治、产业、经济、城市群等各方面均有深远的布局与谋划，将成为“珠三角+相关+澳门”的超大型“城市群联合体”。

林江强调，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过程离不开金融的

支持。对此，林江从科技金融、跨境金融、绿色金融、融资租赁等方面介绍了金融如何促进湾区建设与双循环新格局对接。最后，林江建议，今后还需要多措并举推动金融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实现金融政策向实体项目的转化。同时，要建立健全大湾区资金良性循环使用机制，使大湾区地区内外资金循环高效流通、良性循环。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金融服务业发展中的广州角色



项后军，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院长，教授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将金融业列为重点合作领域，主要目标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发展大湾区高端金融服务业及特色金融产业”、“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共建粤港澳金融合作发展平台”。这四个目标的共同交集且广州又能起到作用的高端服务业及金融特色产业为资产管理。

项后军强调，资产管理是发展大湾区高端金融服务业及特色金融产业的重要抓手之一，是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动力之一，也是共建粤港澳金融合作发展平台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尽管大湾区规划已经重点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资产管理业务的重要性，但总体来看，大湾区（包括广州）目前在高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上仍较为滞后，这既有产品上的原因，又有制度制约上的因素。

接下来，项后军解释了资本管理的概念为机构投资者所收集的资产被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实际过程，并列举了一些典型案例，比如前段时间很多居民去香港买保险产品业务，还提出对穗岁康管理的一些思考，提到广州可以开发出更有利的资产管理产品。项后军老师表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审批设定，并运营推广；二是自下而上的

通过自身创新摸索出来的方式，并对广州在资产管理前沿业务“科创型企业的知识产权证券化”方面的成功提出高度赞扬。

最后项后军表示，通过国有金控平台来进行增信，随着经验的积累，聚集更多大湾区的科创型企业来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最后推广到全国，就是广州在大湾区高端金融服务业发展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他强调，广州市接下来需要有专注于深入研究大湾区资产管理问题的金融专业团队、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同时广州作为大湾区内的区域资产管理中心能否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踏入新台阶的重要基础，就是保证广州资产管理业务的创新不会造成市场风险上升，以及确保监管政策不会过多干扰到广州的资产管理产业的发展探索。总之，广州的角色是值得期待的。

外部冲击、政策创新与湾区经济



程永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程永林认为，湾区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和复杂性交织的长期过程，需要科学规划、制度保障、战略布局、定位清晰、错位发展、协同推进。研究美国、日本等地湾区发展进程可以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带来以下一些经验和启示：一是建立多方合作机制，二是政策创新与市场机制推动，三是城市功能分工明确，四是教育和科研机构高度密集，五是不断探索和推进湾区发展模式转变。

研判当前局势，我国面临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双重挑战。国内挑战包括，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的机制体制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国内政策红利消退，人才支持力度需要加大，企业融资需求需要满足，产业面临转型升级，以及资源需要更高效配置等方面。国际挑战则具体指，国际经济增长趋缓以及中美贸易关系高度不确定

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增长处于低迷状态，全球化红利暂告一段落。2015年开始美国战略界对华关系展开辩论，此后中美贸易关系进入紧张状态。中美贸易摩擦外加疫情冲击，中美冲突加剧。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程永林认为中美关系紧张显露了我国对贸易和技术的外部依赖性。程永林指出，技术无法在封闭状态下研发，并且贸易脱钩可能会导致产业转移，经济脱钩削弱“压舱石”效应，因此要慎重看待“脱钩”。

目前，中美两个大国的摩擦无法避免，这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多大影响？程永林对此做了严谨的学术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中美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验证了国际战略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即中美政经分离。在另一个研究中，程永林考察了中美冲突对中概股退市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概股选择退市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在美上市企业更关注双边政治冲突发生频率，而忽略冲突事件本身内容。

面对这些挑战，我国在战略布局上做了及时的调整，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此，粤港澳大湾区责无旁贷，应当发挥其比较优势，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从中小企业需求角度看 湾区科技创新的破局点



黄斌全，中大咨询研究院院长

首先，黄斌全指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科技发展方面存在部分湾区城市对科创人才帮扶政策的政策显示度和政策精准度不够，科创资源闲置，创新服务缺乏

等的主要问题。他认为构建湾区科技新发展格局，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打赢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关键的落脚点是要实现服务的高级化和现代化。

接下来，黄斌全对大湾区科技创新生态作了三点判断。第一，大企业的创新困境、创新政策环境的持续完善，会把中小企业逐步推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主体，它们将承担更多的研发工作，推动科技成果产品化和产业化的过程。第二，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资本仍然是重要的，但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能否快速响应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同周期的各种科技服务需求，对粤港澳创新生态培育将是至关重要的。第三，在科技服务方面，湾区拥有较好的资源，但科研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科研资源分布不均、服务内容对接低效等问题同样存在，成为湾区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的制约因素。他认为当前湾区的科技创新将面临全面的“范式升级”，通过资本的直接输出已经很难满足创新创业企业的多元化服务需求，湾区产业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的布局变得尤为重要。

最后，他提出湾区科技创新的破局之道要重点关注“一链”和“一平台”。“一链”指在范式升级的过程中，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解决科技创新链上各个主体和各个环节的痛点，构建创新价值链，提供科技资源对接、知识产权服务、科技金融服务、高校创新项目孵化加速、产业孵化服务、产业空间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服务。“一平台”指在范式升级过程中，市场化创新服务的组织平台是重要的，资源链条的搭建和响应需要一个具有组织力和运营力的“织网人”的角色。由组织平台规划整合集团内共享设施，密切协调集群参与方、制定集群战略发展方向、促进集群创新，提供专业咨询项目机会等。

粤港澳大湾区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的政策体系分析



谢宝剑，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谢宝剑重点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使命、区域协同创新状况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撑体系三个方面。首先，从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使命来看，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科技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一方面，构建开放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第一，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更好发挥内地与香港、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的作用，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和产业优势，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开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众创空间建设，支持其与香港、澳门建立创新创业交流机制，共享创新创业资源，共同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多机遇和更好条件。第二，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科研机构 and 重大创新平台在大湾区布局建设。第三，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粤港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高水平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发展计划和粤港联合创新资助计划，支持设立粤港澳产学研创新联盟。

另一方面，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第一，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建设培育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企业的技术中心；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有序开展国家高新区扩容，将高新区建设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节点和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重要基地。第二，推动珠三角九市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支持创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第三，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中新广州知识城、南沙庆盛科技创新产业基地、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支持香港物流及供应链管理应用技术、纺织及成衣、资讯及通信技术、汽车零部件、纳米及先进材料等五大研发中心以及香港科学园、香港数码港建设；支持澳门中医药科技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推进香港、澳门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建设。

接下来，谢宝剑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当前的现状。从各个城市间的合作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创新协同基本遵循区位相近、中心凸显、优势互补的原则。从中心城市专利合作的辐射范围看，广州（8个）、深圳（7个）与大湾区几乎所有的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但是香港仅与4个城市存在专利合作，广州与深圳在大湾区内中心城市作用凸显。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存在协同发展不均衡现象，广州、深圳、香港、东莞、澳门、佛山、惠州等5个城市协同创新发展程度较好，肇庆、江门、中山等4个大湾区外围城市协同创新发展程度较弱。

最后谢宝剑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需要有配套的政策支撑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应包括跨境科技金融，资金、设备过河及配套机制，成果转化配套政策和自由发展的人才政策四个方面。

▶ 我院顺利举办第二届“布鲁金斯-暨南”中国微观经济政策论坛



2020年10月16日-17日，第二届“布鲁金斯-暨南”中国微观经济政策论坛在线上举行。本次论坛吸引了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全球劳动组织（GLO）、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的学者们齐聚一堂。本次论坛聚焦环境、劳动两大议题展开讨论，并开设两场圆桌论坛。

会议伊始，IESR院长冯帅章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Clifford Winston教授致开幕词。冯帅章首先欢迎所有的参会者，他表示在疫情影响及当前的国际形势下，IESR积极利用线上及线下的平台，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尤其珍惜与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机构共同组织学术活动的机会。Clifford Winston认为本次论坛给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希望未来“布鲁金斯-暨南”中国微观经济政策论坛可以持续举办。

10月16日，在环境主题的研讨会上，Junji Xi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分享了

题为 Location-based Policies and Unintende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Evidence from an Industry Relocation Policy in China 的报告，ShanJun Li (Cornell University) 对文章进行评论；Pinghan Li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分享了题为 Attentions Online, Abatement Offline: a Natural Experiment from the Social Media in China 的报告，Guojun He (HKUST) 对文章进行评论；Peng Zhang (CUHK Shenzhen) 分享了题为 Weather, Climate Change, and Land Use: a High-resolution Analysis in China 的报告，Joshua S. Graff Zivin (UC San Diego) 对文章进行评论。

10月17日，在劳动主题的研讨会上，Holger Sie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分享了题为 Migration Controls, Urban Fiscal Policie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China 的报告，Hong Song (Fudan University) 对文章

进行评论；Zhe Yang (Jinan University) 分享了题为 Externality of Parental Absence on Peers Personality Traits 的报告，Elira Kuka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对文章进行评论；Zhangfeng Jin (Zhejiang University) 分享了题为 Welfare Magnets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的报告，Klaus F. Zimmermann (GLO) 对文章进行评论；Xuezhu Sh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分享了题为 The Role of Social Norms in Old-age, Support: Evidence from China 的报告，Zhong Zha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对文章进行评论。

10月16日的圆桌论坛由Clifford Winston教授主持，他基于上午的三篇文章的报告，与参会者讨论了空气污染、环境治理政策等方面的话题。

10月17日的圆桌论坛由冯帅章教授主持，他与参会者讨论了我国的户籍制度对国内人口流动的影响，人口流动如何改变城乡居民的就业、福利，以及户籍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成立于1927年，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远、研究之深

入，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其宗旨是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研究，并据此提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用性的政策建议，以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全方位的市场营销、政策实业家的卓越领导力被誉为最有影响力、最值得借鉴和最受信任的智库。

2019年，我院与布鲁金斯学会实现了首次合作。该系列论坛也是我院在智库国际化发展方面做出的重要努力。

此次会议还收到了参考消息网的报道。



“问政暨南”系列论坛主要关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以数据为基础，以政策研究为导向，为学术界、政策界和业界的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程名望：关注新冠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4月22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程名望教授作客我院“问政暨南”系列第12期讲座活动，并作了题为“新冠疫情的公共危机属性及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的报告。

程名望教授首先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分析了新冠疫情的公共危机属性，而强力的中国政府处理这类公共事件更加有效。他认为尽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很大，但都属于短期冲击。

随后，程名望教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为：经济总量大，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主要是依靠投资的推动。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有四成依靠要素投入，六成依靠效率和创新。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体制的改革。据此，程名望教授预测今后中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紧接着，程名望教授提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点：经济快速下滑；民间投资快速下滑；国进民退，效率受损。考虑这次疫情，程名望教授解读了四个热点问题，他认为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本币贬值压力犹存但不会大幅贬值；地产市场的黄金期已结束，但增长期犹存；资本市场虽然乐观，但是大牛市条件仍不具备。

最后，程名望教授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针对疫情后可能存在的隐患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不宜和美国脱钩；（2）不宜质疑市场化；（3）不宜逆城镇化；（4）不宜民粹主义。

陈剑：利用信用风险量化模型预测新冠病毒疫情趋势

4月30日，信风金融科技的创始人兼CEO，MSCI公司亚太区ABS业务高级顾问，财新智库高级顾问陈剑博士受邀作客我院“问政暨南”系列讲座第13期活动，作了题为“利用信用风险量化模型预测新冠病毒疫情趋势”的报告。

陈剑博士介绍了信用风险的量化模型对于新冠疫情预测的准确性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介绍预测模型之前，陈剑博士首先强调了疫情预测的重要性，他认为预测主要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不同国家的预测难度并不一致，例如，美国预测的难度很大，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制度、防控措施和贫富差异所造成的，并指出美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检测不足。对全球疫情的预测来说，陈剑博士提出的TMM模型对于相对封闭的环境更加准确。

随后，陈剑博士通过趋势对比和简单的线性估计，分析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防治效率。中国除湖北省外地区的防治效率最高，湖北省内由于疫情过于严重，效率有所降低，但都远高于其他国家。韩国改进后的防治效率大大提升。

关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陈剑博士在论文中预测到新冠疫情将严重影响中国消费信贷。具体表现为：首次逾期率飙升后下降，低收入人群受冲击更高、低额贷款风险更高、逾期转化率持续恶化、早偿率下降后明显反弹。最后，陈剑博士指出了预测的有限性。面对外部冲击下，以前的模型可能会失效，对此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探索新模型。



赵德余：农村土地第三轮承包制度设计的正当性分析



6月10日，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问政暨南”第14期邀请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赵德余教授，讲座的主题为“农村土地第三轮承包制度设计的正当性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背后，牵涉的是农村土地的利用与归属问题，事关农民对土地权利的长期期待。因此，理解土地承包权及其分配不仅要考虑现实政策决策逻辑，还要回到政治哲学中分析权利的正当性。赵德余教授利用不同情形下土地承包案例，分别比较三种正义立场对政策道德基础解释的逻辑差异。这三种正义立场分别是：“程序即正义”的诺齐克古典自由主义正义立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罗尔斯立场以及“作为产出效率的正义”的功利主义立场。

诺齐克式、罗尔斯式及功利主义三种立场出发的正义原则为第三轮土地承包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考。赵德余教授认为，2019年《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中提到第二轮承包期结束后的土地承包继续顺延30年，给社会及承包户带来的将来带来了稳定性预期，承包权稳定不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选择。

汪德华：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风险及“社保增值税”的应对思路

7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作客我院“问政暨南”系列第15期讲座活动。当前，我国已形成职工加居民两类养老保险覆盖全民的格局，但一些突出难题缺乏明确的解决思路，三元悖论难以突破。汪德华基于自己的研究，探讨了中国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他以不同的参数对养老保险的缺口进行了测算。总体上看，未来养老金缺口的严重程度，与政策参数的选择密切相关。在悲观情形下，2050年前后企业职工养老金缺口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左右，但如果养老金增速放缓，渐进式延迟退休、征管效率提升等改革也尽快推进，则十余年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甚至会出现年度盈余。

汪教授提出了应对养老保险可持续风险的一般思路：坚持市场化取向，以结构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补充养老保障的制度性安排；推进社保领域的参数化改革。有鉴于此，汪教授提出了社保增值税的应对思路：通过增值税等间接税筹资，建立覆盖全民的国民养老计划；降低现有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缴费全部用于建立个人账户；并设计合理的制度转移接续办法，实现制度平稳过渡。他认为构建社保增值税优势明显，能够以最快速度、较低管理和实施成本实现合理可控的全民“老有所养”；回避了现有改革思路遇到的重重阻力，破解碎片化格局，增强缴费激励；也确保了社会保障资金的充分与稳定。但社保增值税在重构养老保障体系中也存在一些劣势，如增加非劳动者的税负，短期可能影响消费等。



孔祥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教授受邀作客我院“问政暨南”系列讲座第16期活动，作了题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报告。本次讲座的举办方式为线上讲座。

中国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的一大任务就是建设现代化农业。孔祥智教授认为，随着消费模式的变化，农业已经从单纯提供食物上升到提供旅游、娱乐、健康、文化等复合产品的多功能性产业，但是全国小农户经营的总体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必须在小农户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二，怎样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孔祥智教授根据农业收入占比，将小农户分为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和非农户，并根据小农户的不同类型，对其纳入现代农业体系的方式提出了不同的策略。他指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两种重要形式：一是土地流转，二是小规模+社会化服务。

最后，孔祥智教授介绍了两家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其中，河南荥阳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为农户提供农业全程化社会服务的方式，不仅实现了合作社盈利，同时也使得农户增产增收。另外，黑龙江克山县仁发农机合作社虽然在成立第一年由于经营理念问题出现了亏损，但后期通过“保底+分红”模式吸引农户加入合作社，并开展“土地入股”等创新，增加了农机的使用率，不仅使得合作社反亏为赢，还使得土地增产。



封进：我国社会医疗的发展及其道德风险问题

10月27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封进教授受邀作客我院“问政暨南”第17期活动。所谓道德风险即指医疗保险能够带来医疗消费价格的下降，从而增加医疗服务需求，带来社会福利损失。然而，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不仅是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也可能是来自供给方的道德风险。医疗供给方会诱导有医保的患者产生更多的医疗需求，从而加剧道德风险。在谈到关注道德风险的原因时，封进认为，从最优制度设计的角度考虑，需要权衡医保分散带来的社会福利增加和道德风险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封进通过对比现行政策中典型城市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的报销规则，以及对现行医保付费总额控制等政策的分析，向我们介绍了我国医保的制度设计与费用控制措施。封进还通过文献回顾的方式，对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初步评价。如何把国外流行的理论方法和中国医保当中的重大问题与民众福利真正的结合起来，医保研究领域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关于现有医疗保险的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封进认为，单独看门诊的最优报销比例可能忽略了我国门诊和住院之间的联系，同时对于医疗服务而言，是以“需要”还是以“需求”来判断医保对个体福利的改善，这可能需要考虑我们的国情，因此，在现有道德风险的分析框架之中纳入公平因素，是比较必要的。



阮建青：危机冲击、产业政策与产业升级

10月30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的阮建青教授受邀作客我院“问政暨南”第18期活动，为我院师生作了“危机冲击、产业政策与产业升级”的主题讲座。

首先，阮建青教授介绍了温州皮鞋厂的典型案例。温州鞋业一开始均采用低质低价的竞争策略，后来许多企业开始造假，以致温州皮鞋一度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随后温州鞋业协会成立，政府也成立了鞋质量管理办公室，加强质量监督，规范竞争模式。最终温州成为了中国著名鞋都。这就是产业集群从低质量均衡走向高质量均衡的一个转变过程。

接着阮建青教授利用1990-2008年浙江省85个产业集群和53个主要危机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危机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示危机会重塑企业和政府对质量升级的回报和成本的看法，公私营机构也更有可能会采取集体行动来改善产品质量。最后当危机结束，产业集群中的专利数量、质量认证企业数量、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显著上升。因此，危机不仅代表危险，也意味着集群产品质量升级的机会。

最后阮建青教授谈到今年的新冠疫情和贸易战，他表示美国停止供给芯片虽然打击了中国手机市场，但国内芯片技术的产业集群开始加速对芯片的研发进程，国家也给予了更多的政策支持。阮建青教授认为，在危机不可避免的时候，这些危机有可能就是促进中国新兴产业从低质量均衡到高质量均衡转变的一个契机。



周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江苏经验与展望

11月11日，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问政暨南”第19期邀请到了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力教授。江苏省在扶贫历程中取得了重大成效，然而江苏提出的一系列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的重点任务，并未很好的呼应江苏在十三五末期面临的问题。首先，试点地区的相对贫困标准为盯住低保标准，但相对贫困的标准并不一定是低保标准，本质上并不反应相对贫困。其次，试点地区提出的重点举措仍是解决绝对贫困的主要方式。

周力通过介绍发达国家在制定相对贫困标准上的一些经验和理论研究，指出了国外相对贫困经验理论中的几点问题，一是忽视了培育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性，忽视了两线并行的中国特色；二是忽视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相对收入的假说也低估了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的社会保障性；三是忽视了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在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需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关系等。

周力认为，江苏省“十四五”期间设立相对贫困标准的基本原则应遵循以下几点：一是坚持政策实践与学理机制一致，二是坚持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统筹，三是坚持兜底保障与产业扶持相结合。其中长期目标应该是改变收入分布，降低相对贫困的发生率，短期目标是提升农户收入的流动性。在江苏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之下，应继续关注农村相对贫困标准，设立全省统一的相对贫困标准，同时，以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每年进行调整，以便对相对贫困群体实行动态监测。



徐现祥：中国营商环境需求侧建设调查报告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11月25日，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问政暨南”第20期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徐现祥老师，为我们介绍我国营商环境改革的进展情况。

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市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徐教授指出当前市场主体面临的主要困难从与政务服务相关的“准入难”转变为植根于市场供需层面的“成长难”，这给企业成长阶段的营商环境建设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在成长阶段，市场主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竞争激烈”、“招工困难”、“融资困难”、“办证难”，相对应的改革工作重点是扶持市场主体成长和高质量发展。政府应该通过“提升政务服务”与“开放市场领域”的组合拳，助力不同市场主体的成长和转型，尤其是助力小微企业的高质量成长。

徐教授及其课题组在2018-2020年连续三年走访全国各地的政务办事大厅，随机访谈前来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从市场主体侧评价全国商事制度改革的情况。从全国来看，当前的商事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徐教授同时指出当前的改革面临着办证数量进一步减少幅度不大、数字政府普及度不够、扶持政策不精准、各地政务服务改革进展不均衡等问题。为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徐教授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第一，提高站位、转变观念，从方便管理转向方便办事。第二，深化减证数量工作，打一场“减证”攻坚战。第三，加快数字政府需求侧建设，好用好管。第四，加强精准施策满足企业政策需求，建立长效机制助力企业成长。

庄太量：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全球经济



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未来全球经济将如何变化？12月3日，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问政暨南”第21期活动邀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量教授，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带来了题为“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全球经济”的讲座。庄教授重点从疫情如何影响中国和全球经济、美国减息及推出量化宽松计划的影响、中美角力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未来全球经济走势。

庄教授认为疫情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目前世界各地的经济正在逐渐复苏。从国际上各地主要经济体的GDP、失业率、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新冠肺炎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严重冲击，但目前各国经济呈复苏趋势。在中美角力的大背景下，庄教授重点介绍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缩写为RCEP）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庄教授认为实施统一的区域累积的原产地规则，有助于提升RCEP国家区域产业链分工效益。此外，RCEP拓宽了对服务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准入，采用负面列表模式加大投资开放。RCEP允许关键生产要素之一的人力临时入境，为跨国投资活动投资提供便利。未来RCEP正式生效意味着区域内经贸活跃度将会提升，对外资金吸引力进一步上升，有助区域各国进入资本支出上行周期。最后，庄教授也指出现在RCEP签署并不等于正式生效，需要超过九个RCEP参与国会批准同意后，RCEP才能达成生效条件。

广东移动蜂巢大数据能力介绍及应用案例分享

10月23日，我院“IESR+”系列讲座第8期活动邀请广东移动大数据应用创新中心技术经理吴梅，为我们介绍了移动通信运营大数据的特性，以及如何应用大数据服务于民生、政务、交通、商业、城市建设等方面，实现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首先是移动通信运营的大数据的多样性和安全性特点。吴梅介绍说，广东移动目前拥有存量用户超过1.2亿，在广东市场占有率达74%，因此相应的数据在量级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时，移动通信涉及的数据也十分多样，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上网行为、位置数据、通信消费等信息。同时，吴梅强调移动非常重视数据安全性与隐私，并且严格执行国家、行业、中国移动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商家也不会触及到客户的隐私信息。

其次是大数据应用的服务场景非常广泛。广东移动“蜂巢大数据”品牌产品，主要分为洞察类、触达类、信用风控类三大类产品。其中，蜂巢热图能够实时对人口分布进行热力监控，可以实时了解客流状况；蜂巢人口分析则用于建设城市人口模型，监测城市常驻和流动人口，例如用于分析疫情后人口回流情况；另外还有蜂巢政信、蜂巢外呼、蜂巢调查、金融验真等产品。

广东移动蜂巢大数据目前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研究报告、数据API端口，也与政府、高校、企业等单位建立联合实验室，致力于运用大数据服务民生、建设智慧城市、提供更精准的商业服务等方面。



何世友：以端和云的进化推演服务数据的大趋势

以2007年第一代苹果手机的发布为标志，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大发展不仅颠覆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渠道。10月29日，我院“IESR+”系列讲座第9期活动邀请广州爱范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TO和知晓云负责人、移动互联网应用专家何世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移动互联网应用形态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解读了以微信为代表的熟人网络传播的逻辑演化，并展望了云计算、5G等技术进步带来的“端云变革”。

何世友以智能家居、Siri Shortcuts等移动操作系统的持续集成为例讲解了智能终端的进化，以技术平台软件架构的变迁讲解了云服务的进化。同时何世友展望了未来服务数据的大趋势。首先，在移动流量平台化的前提下做更为精准的投放，比如微信的朋友圈广告能根据地域、兴趣进行精准投放。移动互联网是最真实的流量平台，在移动流量真实的前提下能做更为全面的效果监测。第二，实现交易线上线下的无缝集成。微信支付解决了线下零售用户支付和用户身份映射难题，真正意义上实现了O2O，蓝牙、ibeacon等物联网技术将服务直接通过物理连接的过程传递给用户。第三，实现服务不分线上线下。小程序和公众号联合同时实现了服务触达和用户留存，微信搜索将实现服务和功能直达，微信小程序插件和小程序矩阵可实现积木式的服务共享。



IES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